

德国社会民主党衰老了吗？

张程 刘玉安

摘要：从《哥达纲领》到《柏林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历经艰难险阻，发展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举足轻重的大党并曾独步德国政坛多年。但自上世纪90年代步入所谓“新中间道路”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背弃了初衷，其执政理念从服务工人群众转向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协调发展，从而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特色，政治影响力也每况愈下，有被排除于主流政党行列之外的危险。德国社会民主党衰老了吗？它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关键词：德国社会民主党；阶级特色；历史使命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8.03.006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经历最坎坷、党员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被认为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头羊。然而，自2005年以来，曾经独步政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已经四次败北。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20.5%的选票，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大政党的地位，但得票率与其后的几个非主流政党包括刚刚组建不久的极右翼选择党已经相差无几，且随时都有被挤出主流政党行列的可能。作为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大佬，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衰老了吗？

一、工人阶级的政党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组建起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8革命时期的德国工人协会。1863年，费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正式组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奥古斯塔·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实现了联合并通过了著名的《哥达纲领》，现代意义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予了高度关怀和密切关注，把它当作自己的政党。对于该党通过的第一部纲领即《哥达纲领》，马克思曾经几乎是做了逐词逐句的推敲、批

作者简介：张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玉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与民主社会主义新变化研究”（17JJD710004）。

评和指正。恩格斯更是成为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经常的撰稿人。

当时的德国刚刚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兴未艾。1871年德国的煤产量还只有2940万吨，生铁156万吨，铁路18500公里，而到了1880年德国的煤产量达到了7020万吨，生铁465万吨，铁路41818公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创立时，德国的工人总数仅为200多万，1871年则达到了820万，1882年达到了1135万，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5%^①。

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很快在德国各地建立起了几百个基层组织，并拥有了上千家报刊和出版物。在1877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居然获得了49万张选票和12个议会席位。虽然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没有直接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挑战，还仅限于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来保证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但这已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于是，德国政府于1878年制造了一个理由，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该党的所有刊物被查封，党的许多领袖和骨干被流放，党的各种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转入地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公开号召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转入地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建议。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由于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非常法令》事实上并未能遏制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在1884年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增加到了55万张，议会席位达到了24个。

这一事实使德国政府意识到：对于工人运动，显然不能纯粹依靠武力镇压，工人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于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于1883、1884和1889年连续通过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三部法律，建立了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1890年9月，《非常法令》也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这些法律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人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但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却有所改善，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改变。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对工人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政府一边，他们就不会追随社会民主党人了。

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890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猛增到142万张，得票率达到了19.7%^②。这个成绩，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相信议会道路和合法斗争，它因此也逐步放弃了一些过于激进的提法，更加关注工人群众当下的、直接的现实利益，如普遍选举权、结社自由、8小时工作制等等。结果，其选票节节攀升：1898年突破了200万张，1903年突破了300万张，1912年则达到了425万张，占选票总数的34.8%，获得了110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最大政党^③。

最为关键的是，整个西方特别是德国的资本主义当时还处于上升时期，这一点从下表可以窥见一斑：

① [德] 汉斯-乌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② [英] 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③ [英] 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表 1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上升

	德国	大不列颠	法国	俄国	意大利	美国	世界
1860	14	34	26	8	n/a	8	14
1870	18	44	34	13	17	11	19
1880	25	53	43	17	23	17	26
1890	40	62	56	27	40	39	43
1900	65	70	66	61	56	54	60
1910	89	85	89	84	99	89	88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8 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913 年为 100 的话，工业革命完成最早的英国，1860 年工业产值也仅相当于 1913 年的 34%，位居第 2 位的法国相当于 1913 年的 26%，工业革命起步较晚的俄国和美国才仅相当于 1913 年的 8%，全世界平均仅相当于 1913 年的 14%，德国那时的指数也是 14，即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尽管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调整的空间，各国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正如德国的俾斯麦政府那样，它所出台的社会政策虽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广大工人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处于上升态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显然更能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愿望。这一点恩格斯在晚年也意识到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发展在当时还远没有达到顶峰，马克思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缺乏付诸实践的历史条件^①。

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912 年成为德国政坛的最大政党，这使它更加坚信议会道路。因此，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保卫国家为名选择了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立场。在战争失败、德国政坛陷入危机和混乱之际，德国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虽然它未能像马克思曾经希望的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但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还不失为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由于德国工人阶级还处于发展壮大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遭受到一些挫折，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社会民主党甚至被取缔，但它在德国政坛的影响力却坚如磐石，因为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

二、全民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欧各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同时，也给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时，整个德国没有一座完整的城市，在任何一座城市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楼房，在任何一座楼房几乎没有一扇完整的玻璃。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就被取缔了，党的领导人遭遇了暗杀、逮捕、流放和监禁等残酷迫害，党内精英和骨干也被迫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结束后恢复了合法地位，但由于组织机构已被完全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处于重建之中，无法

^① 张世鹏：《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主义起源探究》，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 年第 3 期。

正常地参与政治活动。而经历了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也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这在客观上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使它在战后的德国政坛上一度独占鳌头。

战后,库尔特·舒马赫出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重建后的第一任主席。这一时期,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偏激,但是从思想观念到言辞语气都过于传统,不符合战后德国的实际情况。但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1949年战后德国的首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29.2%的选票和139个议席,到了1953年第二次选举,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又明显下滑,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则大幅上升到了45.2%。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墨守成规,没有任何调整。到1957年第三次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飚升到50.2%,即它独自获得了绝对多数,这在德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有所回升,但还是只有31.8%,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少了将近20个百分点^①。

1957年选举惨败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改革。1959年在哥德斯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社会民主党与传统彻底决裂。《哥德斯堡纲领》不仅公开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提法,还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还首次明确承认教会组织为社会伙伴,并声称要尊重其特殊提案,对它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保护。这显然是想争取广大的基督教选民。用瓦尔特的话来说就是:“1959年11月13—15日,在巴特哥德斯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史上伟大的纲领转折。从此,它不再坚信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而是深信基本价值和多元主义。”^②这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由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全民的政党了。

这一转变很快收到了效益。在1961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终于打破了30%的魔咒,上升到了36.2%,1965年又上升到39.3%,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差距越来越小,社会民主党有望获得久违了的政权。

1965—1966年,德国经济出现了低迷,为了平衡预算,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决定提高税收,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坚决反对,几名自由党部长集体辞职,导致联合政府垮台。与此同时,德国新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力量都非常活跃,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决定与自己多年的竞争对手合作,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新任主席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席勒出任经济部长。在人们对社会民主党还普遍怀疑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连续执政将近20年的资产阶级大党的认可,并且主管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两个部门——外交部和经济部,这对已经靠边站了17年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至少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当时领导大联合政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政府总理基辛格1966年12月13日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这样说:“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决心在联邦范围内共同组阁……这无疑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是我国人民寄予许多希望和关怀的事件。人们希望在联邦议院中有远远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大联盟成功完成交付于它的使命,特别是调整公共财政收支,紧缩行政开支。人们关心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货币的稳定。”^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不负所望。在被誉为德国经济政策超人的经济学家席勒的精心调整

① [德] 弗朗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7、89页。

② [德] 弗朗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③ [德]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 Inter Nations 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下，德国经济很快走出了低迷，公共财政也日渐平衡。在外交方面，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勃兰特积极推动新东方政策，促成了与民主德国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关系的解冻。

社会民主党负责任、敢担当的精神和治理能力征服了选民。在 1969 年的选举中其得票率又增加了 3 个多百分点，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42.7%，成为议会最大政党并获得组阁权，它随即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由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终于成为德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在外交方面，社会民主党政府继续推进大联合政府时期的新东方政策。1970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在参观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并向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下，突然在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时期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做了真诚忏悔。尽管他本人也深受纳粹迫害，二战期间一直在与纳粹做坚决的斗争。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德国，为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好感，赢得了广阔的国际活动舞台。就在当天，联邦德国与波兰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友好条约。随后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也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友好条约，联邦德国正式回归国际社会。

从 1966 年参与执政到 1969 年主导政府，德国不仅在外交上有了重大突破，在经济上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德国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65 年，德国人均社会保障费还只有 888 欧元，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的第二年，这个数值就达到了 1044 欧元，到 1972 年议会换届选举时，这个数值已经大幅提高到 1723 欧元^①。这在当时是西欧、也是全世界社会保障水平的最高程度，德国的社会团结水平、社会凝聚力达到了空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一个全民国家。这为后来的东西德统一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赢得了 1972 年的选举，得票率再创新高，达到了 45.8%^②。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勃兰特继续担任总理。

1974 年，由于自己的秘书被指控为东德间谍，勃兰特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继任的施密特继承了勃兰特的所有政策。1973 年第一次石油价格暴涨虽然使德国经济受到重创，但凭借巨大的贸易顺差，德国成功地抵抗住了这一波冲击。此外，社会民主党政府还遣返了 50 万没有长期工作许可的外籍工人，这也有效地缓解了由于石油涨价、经济萎缩造成的失业压力。在 1976 年国会选举中，由施密特挂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获得了 42.6% 的高票并继续执政，施密特继续担任总理。

但是，当 1979 年国际石油价格再次暴涨时，德国已经没有了贸易顺差，也没有可以遣返的外籍工人。依靠此前良好的执政表现，社会民主党虽然以 42.9% 的得票率赢得了 1980 年的选举，但从 1981 年开始，德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失业率攀升。1982 年，联邦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 200 万。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社会民主党主张采取传统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需求、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而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则坚决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并转向了以科尔为领袖的联盟党一边，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 16 年（其中有 3 年为参与执政）后再度被挤下政坛，成为反对党。

① 姚珍珍：《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3 页。

② [德] 弗朗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3 页。

三、新中间阶级的党

按照目前德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一个政党如果长期不能上台执政,它的政治生命力和政治影响将逐渐消退,将逐渐被边缘化。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想保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就必须上台执政。在某种意义上,选票就是一个政党的生命线,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自1982年被迫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1983年,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下降到38.2%,1987年又再次下滑到37.0%。之所以出现这种每况愈下的现象,是因为进入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群众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稳定的票仓。进入80年代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急剧萎缩。1970年,德国工人在全国就业人口中还占据51.2%的绝对多数,198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1.5%^①,而到了2000年,德国工人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占35.2%^②。

雪上加霜的是,在工人阶级队伍萎缩的同时还发生了思想上的严重分化。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进入80年代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物质主义时期,阶级地位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铁板一块。随着绿色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以及欧洲一体化运动等的兴起,德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一代德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和形式趋向多样化,传统政党在他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很少有选民对某个党派有稳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代表特定价值取向、特定群体利益的小党,以及抗议党和单一议题党的数量越来越多。1972年,参加西德联邦选举的政党只有7个,1998年则增加到了33个^③。在2017年的这次大选前,德国登记在册的政党总数达到了112个,其中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的政党增加到了34个^④。

由于众多政党的参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老牌政党的主流地位必然下降。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作为传统大党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和较小规模政党之间的差距开始明显缩小。由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生态环境、移民、多元文化等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所有政党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选民都共同关心的议题,为了争取最大数量选民的支持,每个党派都会以“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标榜自己,社会民主党的全民党定位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感受到了工人阶级队伍萎缩、选民思想分化给它带来的挑战,开始考虑战略调整。1985年,由党主席勃兰特挂帅,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一

① Yuko Aoyama and Manuel Castell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s of G-7 countries, 1920-2000",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002, Vol. 141, No. 1-2, p. 139. (注:该数据只包含德国非农业就业人口。)

② 数据来源:"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2010", <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labour-force-statistics>.

③ 伍慧萍、姜域:《西方小规模政党的生存现状与成功条件:以德国为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④ 德国联邦选举监督网: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de/>.

个负责起草新的基本纲领的基本价值委员会，以迎接时代的挑战。苏东剧变加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1989年12月，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新的纲领，即《柏林纲领》。《柏林纲领》虽然充分肯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以往成就，强调了党的左翼人民党的身份，但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为了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进一步划清界限，柏林代表大会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文件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都不见了，代之为更加中性、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把自己打造成所谓“新中间阶级”的党。从那时候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事实上已经完全认可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阶级特色。这一转型有一定的效果。1994年的联邦议会竞选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有所回升，达到了36.4%。

1994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持续低迷。1996年，德国的失业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了10.4%，1997年则进一步飚升到11.4%。执政的联盟党对于持续的经济低迷束手无策，这给了已在野16年的社会民主党机会。社会民主党以“劳动、革新与公正”为口号，提出了一套吸引大多数选民的社会政策，结果得票率有了大幅上升，达到了40.9%，比1994年上升了4.5%，联盟党的得票率则下降了6.2%，仅为35.2%。社会民主党以第一大党的身份与绿党结成执政联盟重返政坛，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政府总理。

重返政坛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执政策略。用施罗德的话来说就是：德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所谓“新中间道路”。为了刺激持续疲软的德国经济，社会民主党不是刺激消费，而是采取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减税措施。社会民主党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先前的12360马克，逐步提高到2002年的14000马克，与此同时，起征税率从25.9%降低到19.9%，最高税率也从53%降低到48.5%。施罗德的解释是这叫放水养鱼，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

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意味着政府财政必然减少，意味着政府财政开支必须压缩。而在当时德国政府开支中，占比重最大的社会保障开支（从1995年起已经突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必然首当其冲。社会民主党政府甚至做出承诺：每年要减少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的社会保障开支，其主要措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从而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

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方略有一定的效应。德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复苏，失业率明显下降。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出意外地又赢得了2002年的大选。它的得票率虽然有所下降，仅为38.5%，但由于其竞争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仅为29.5%，社会民主党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从而得以连续执政，施罗德继续担任政府总理。

但是，当时整个西方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德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德国的失业率虽然开始下降，但仍然接近两位数，失业人员依然有400多万。为了缓解大规模失业的压力，获得连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哈次改革。

哈次改革对于克服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激励失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国的《光明日报》在2002年6月26日曾经发表了《哈次不让德国人做懒汉》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改革的积极意义。它鼓励人们接受低收入、临时性工作，鼓励失业者自主创业，鼓励失业者接受新的岗位培训等等都无可厚非，但由于多年的经济低迷，社会民主党从其前任手中接管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政府债务，其减税政策又进一步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为了压缩政府开支，社会民主党只能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从2002年开始，社会民主党政府把失业津贴、医疗保险费、养老津贴普遍做了下调，例如把原来由政府负担的医疗项目改为个

人自费,把享受养老津贴的年龄由65岁提高到67岁,把享受失业津贴的最长时间由原来的32个月缩短为12个月,12个月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只能接受标准更低的社会救助,而且还必须接受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等等。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以牺牲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是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自居的,而且无论是在它的早期、战后初期甚至1998年和2002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确实主要是靠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失业人员的选票才取得执政地位的,而哈次改革却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爆发了德国重新统一以来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哈次改革,特别是抗议关于失业政策的改革。这一反抗活动在德国持续了数月,在一些地区甚至持续了许多年。社会民主党因此失去了一大批传统的支持者。

哈次改革的负作用在2005年的大选中得以充分显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由2002年的38.5%下降到了34.3%,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则由29.5%上升到了35.2%,社会民主党在丢失了几百万张选票的同时也丢掉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基督教民主联盟以第一大党的身份组阁,党的领袖默克尔出任政府总理并且开始了德国政坛的一个新时代。社会民主党不仅被挤到了一个配角的位置,而且每况愈下。在2017年选举中,其得票率又创新低,仅为20.5%,不仅被前面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甩开了一大截,而且还大有被身后的选择党超越的态势。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衰老了吗?

四、结 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信奉改良主义的党,但它最初毕竟明确代表着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毕竟以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因此在早期,尽管曾经两次被取缔、处于非法状态,它依然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政坛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战后初期,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社会民主党虽然打出了全民党的旗帜,但它所提出的具体社会政策、所推行的一些社会改革,还是明显为广大工人群众、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它虽然不再提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毕竟还在改良资本主义。但自上世纪末步入所谓“新中间道路”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迷失了方向,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已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它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其目标已经不是为广大工人群众、为社会弱势群体谋利益,而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协调、更加平稳地运转。如果可以把早期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把二战后至上世纪末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医生的话,那么自“新中间道路”以来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按摩师了。而正是由于它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阶级特色,所以才导致它的政治影响力日渐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衰老了。

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使命是否就此完结了呢?未必。

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为应对德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而组建、发展起来的。一百多年以来,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了很大变化,但它所引发的基本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在早期的几乎所有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有对这一现象的猛烈批判。甚至在标志着向全民党转型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这样批判道:“人把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积累了巨大财富,却未能

使大家公正地分享这个共同成果。”^① 但是，自 1989 年 12 月的《柏林纲领》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调门开始明显降低。这并不是因为两极分化的问题已得到缓解，恰恰相反，是因为自那时以来，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资本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把两极分化问题从少数发达国家扩展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与战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相比，自 20 世纪末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现象都十分突出，下图非常直观地反映出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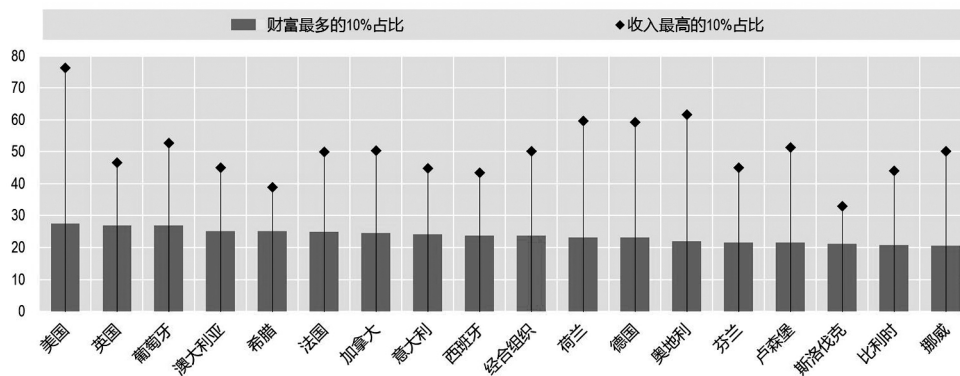


图 1 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 10% 最富有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家庭净财富所占的比重^②
(2012 或最接近年份)

可以看到，在所有发达国家，10% 最富有家庭的税后收入超过税后总收入的 20%，而在净财富上，在许多国家，10% 最富有的家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 50%，德国更是接近于 60%，仅次于美国和奥地利，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只是迫于资本全球化的压力，担心德国资本主义失去国际竞争力，而不敢直面这一现象。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退缩了，胆怯了，不敢亮剑、不敢坚持自己的初衷，从而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与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党。在 2017 年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提出了“服务多数、而非少数”的纲领，结果赢回了多数选民，得票率一举超过了 40%。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也该重新定位了呢？

（责任编辑：李 宏）

^① 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

^② OECD (2016), *Society at a Glance 2016*; *OECD Social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p. 103,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61488-en>.